

研究論文

# 臺灣民衆的家庭語言選擇

葉高華

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通訊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Email: kohua.yap@gmail.com。本研究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5-2420-H-110-004）資助。作者由衷感謝《臺灣社會學刊》編委會與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提供中肯建議，提高本文的論證品質。

收稿日期：2016/07/29，接受刊登：2017/03/29。

## 中文摘要

本研究利用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與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描繪臺灣家庭語言的現況，並在同時考慮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等基本變項的條件下，釐清階級、民族認同與鄰近效應對家庭語言的影響。主要發現如下：其一，雖然新中產階級最偏好跟小孩說華語，但是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條件下，家庭語言沒有階級差異。換言之，新中產階級對於華語的偏好，來自於他們在獨尊華語的教育體制下受過更多的篩選與薰陶。階級本身，並未對家庭語言產生直接影響。其二，中國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但臺灣人認同無法讓流失閩南語的福佬家庭恢復閩南語。其三，家庭語言的選擇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也受到周遭語言環境的強烈影響。居住地的華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華語；居住地的閩南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閩南語。這些發現指出臺灣本土語言的困境：一方面，臺灣人認同未能復興本土語言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持續往華語優占的北部都會區遷移，愈來愈多家庭失去本土語言的環境。因此，即使國家已不再打壓本土語言，本土語言復興運動者依然憂心忡忡。

**關鍵詞：**社會語言學、族群、階級、民族認同、鄰近效應

## **Family Language Choice in Taiwan**

Ko-Hua YAP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depi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mily languages in Taiwan and clarify the effects of class, national identity and location on family language choice, using 2013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nd 2010 census dat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 although the new middle class most prefer Mandari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sses when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b) Chinese identity promotes the use of Mandarin, but Taiwanese identity does not revive the use of Minnan (Hokkien) in the Hoklo Families that has lost their native language; (c) family language choice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neighborhood language preference—as people continue to migrate to northern metropolitan area where Mandarin is dominant, more and more families lose nativ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ese findings point to the plight of Taiwanese native languages.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ethnicity, class, national identity, neighborhood effect

## 一、研究問題

2015年12月15日，客家運動的精神領袖鍾肇政當著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面，哽咽地說：「再過幾年，就沒有人會講客家話了。客家話一旦消失，客家人就消失了。」不久之後（2016年1月8日），蔡英文在電視政見發表會中公開回應：「在這裡，我要當著全國人民的面，告訴鍾老，我不會讓這個事情發生。」她的承諾是：將客家話定為國家語言（民主進步黨 2016）。

199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廣泛接受了「四大族群」（閩南人〔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的族群分類架構。所謂四大族群其實是由歷史上三種相對性的族群區別合併而成，分別是：原住民與漢人之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分、客家人與閩南人之分（王甫昌 2003）。在這三種族群區別中，有兩種與語言區別重合，另一種也與語言區別高度相關。

首先，原住民與漢人之分同時也是南島語系與漢藏語系的區別。原住民的族別劃分又幾乎等於語言的劃分，有什麼族就有什麼語，反之亦然。近年來，原住民族從原先的九族進一步區分成十六族，<sup>1</sup> 語言的獨特性都成為關鍵憑證。

省籍原本只是戶籍分類，不是語言的區別。事實上，第一代外省人來自各種語言 / 方言區，甚至不乏來自閩南語區、客語區者。然而，第一代外省人有高比例的軍公教人員，原本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華語<sup>2</sup>

---

<sup>1</sup> 2001年邵族從鄒族分出，2002年花蓮、臺東的噶瑪蘭族從阿美族分出，2004年太魯閣族從泰雅族分出，2007年撒奇萊雅族從阿美族分出，2008年賽德克族從泰雅族分出，2014年拉阿魯哇族與卡那卡那富從鄒族分出。

<sup>2</sup> 亦即臺灣民衆慣稱的「國語」。如同國旗、國歌等通名，「國語」不能算是特

能力，即使許多人鄉音很重。再者，大多數第一代外省人脫離其母語社群，彼此只能用華語溝通。於是，華語成爲第二代外省人的第一語（first language），甚至成爲外省人身分與集體認同的重要標誌（洪惟仁 1992；黃宣範 1993；蕭阿勤 2012）。也因此，語言使用習慣的差異曾經是日常生活中分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重要表徵。近年來，隨著年輕世代本省人也轉以華語爲第一語，外省人與本省人愈來愈難以區分，也逐漸被認爲沒必要區分。

「客家」最初是廣東粵語人群（廣府人）對於來自惠州、嘉應州的另一種語言人群的稱呼，後來延伸而泛指所有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群（施添福 2013, 2014a, 2014b；林正慧 2015）。「閩南」也是先有語言的分類，再延伸爲人群的分類。「閩南人」、「客家人」的稱呼都是戰後引入臺灣（施添福 2014b；林正慧 2015）。但是，閩南語人群與客語人群的區別遠比這兩個名詞進入臺灣的歷史還要悠久。早在清代，漢人已按照語言分群別類，互稱「福佬」、「客人」（施添福 2014b；林正慧 2015）。到了日本時代，本島漢人的種族區分爲「福建」、「廣東」。字面上這是祖籍的區別，實際上卻是按照閩南語與客語劃分。戶口調查報告寫得很明白：「夫言語即種族之徵表也。言語之異同，則表現種族

---

定語言的專名。臺灣歷史上便曾經歷兩種不同的「國語」。若以「國語」指稱特定語言，帶有語言霸權的意味。目前，語言學界普遍接受以中性的「華語」（Mandarin）指稱臺灣民衆慣稱的「國語」。若要強調臺灣民衆使用的那種華語之獨特性，則稱爲「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教育部頒布的「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與「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皆以「華語」取代「國語」。且「華語」一詞已擴散至日常生活，像是華語教材、華語師資、華語歌曲、華語電影等用語，已相當普及。有些反對「國語霸權」的人常以「北京話」取代「國語」一詞。不過，北京話與臺灣華語不盡相同，應視爲同屬華語之不同方言。基於上述理由，本文以「華語」指稱臺灣民衆慣稱的「國語」。

之異同。」（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1909: 166）然而，將閩南語人群視爲福建人、客語人群視爲廣東人，使得來自廣東省的閩南語人群與來自福建省的客語人群感到迷惘。結果，許多廣東福佬後代的祖籍認同轉變爲福建、福建客人後代的祖籍認同轉變爲廣東（林正慧 2015）。畢竟祖籍容易遺忘，語言差異卻無法充耳不聞，許多人因而按照語言重構自己的祖籍。

1987年，《客家風雲》雜誌創刊，開始提倡客家人的語言權益。翌年，以《客家風雲》爲主體的人士發動「還我母語運動」，其三大訴求爲：開放客語電視節目、修改廣電法對「方言」之限制、建立多元的語言政策（葉德聖 2013）。鍾肇政也參與了「還我母語運動」，並創立「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持續爭取客家語言權益。王甫昌（2003）指出這些社會運動建構了當代臺灣客家族群想像。

當兩群人雞同鴨講時，我群與他者的區隔感便油然而生了。因此，臺灣的人群分類總是跟語言脫離不了關係。然而，經歷半個世紀獨尊華語、打壓本土語言的國家干預後，閩南語、客語與各種原住民族語逐漸撤離公共場域，退守家庭。家庭是這些語言的最後堡壘。如果人們在家裡不再講這些語言，尤其是不跟小孩講，這些語言終將消失。除了原住民身分還能靠國家保護而獲得延續，一旦福佬人<sup>3</sup> 不會講閩南語、客家人不會講客語，人們不免懷疑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區分是否仍然適切。

客家委員會的調查爲上述論斷提供證言。2010年，對於單一自我認定爲客家人者而言，其子女有21.5%不認爲自己是客家人。對於多重自我認定爲客家人者（亦即同時擁有其他族群認同）而言，其子女有

---

<sup>3</sup> 由於使用閩南語的人群不僅來自閩南，也來自廣東潮汕地區，本文沿用民間慣用的「福佬」指涉閩南語人群。

54.6%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進一步詢問這些客家子女為何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48.4%的原因是「不會客語」、33.1%的原因是「父親不是客家人」（客家委員會 2011: 116-117）。<sup>4</sup>事實上，父親不是客家人的家庭，通常也會失去講客語的環境，這在後面還會進一步討論。若詢問：如何加強子女的客家認同？65.9%的客家人表示：讓子女學習說客語（客家委員會 2011: 135-136）。顯然，將客語與客家認同視爲一體，不只是鍾肇政的個人看法，也是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

由此可見，家庭語言的保存或轉移，對於今後臺灣民衆的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具有深遠影響。那麼，臺灣家庭語言的現況如何？爲什麼當公共領域已不再限制各種本土語言的使用、客家電視臺成立了、各種本土語言也進入小學課程了，鍾老還是那麼煩惱？再者，我們也有必要知道，哪些因素影響家庭語言的選擇？本文將回答這些問題。在本節之後，第二節回顧社會學者如何談語言、語言學者如何談社會，而兩者又共同遺留哪些尚未釐清的問題。在第三節中，我將利用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與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描繪臺灣家庭語言的現況。第四節的多變量迴歸分析進一步釐清各種社會因素與周遭語言環境對家庭語言的影響。第五節爲結論，並指出未來研究方向。

## 二、文獻探討

### （一）語言的社會學研究

社會學者對於語言的關懷集中在兩個議題上，其一爲語言與民族主

---

<sup>4</sup> 2014年客家委員會又做了一次調查，結論不變。由於2010年調查報告提供較多細節，本文引述2010年調查數據。

義的關聯。試想，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成員能夠走遍其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認識其國家的每一個人。既然如此，他們如何能夠想像他們屬於同一個民族？Anderson（1983）指出，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富有爆炸性的交互作用，促成以印刷語言為基礎而形成的語言共同體。

在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也跟語言問題密不可分。蕭阿勤（2012）指出，國民黨政府將中華民族與華語劃上等號。使用華語被認為是促進中華民族團結的必要條件；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族語都被貶為「方言」，並被視為有礙中華民族的統一與團結。他進一步指出：

國民黨政府提倡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圍繞在將臺灣人「中國化」的中心目標，亦即宣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合法化其統治、並且將國民黨政府是全中國代表的宣稱正當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臺灣本土語言、特別是臺語的使用，因而受到嚴格限制（蕭阿勤 2012: 244）。

強制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是當年國民黨政府推行華語、打壓本土語言的最重要手段。不僅所有學齡人口都得接受華語的單語教學，一旦學生在校園裡講本土語言被抓到，還會遭受屈辱性懲罰。另一個主要的社會化管道——電視，一方面嚴格限制本土語言的播映時間，另一方面將使用本土語言的角色塑造為粗俗、無知的形象（蕭阿勤 2012）。

王甫昌（1996）指出，臺灣第一波反對運動僅以政治民主化為訴求，並未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根基：中國民族主義。但第一波反對運動遭到鎮壓之後，反對運動走向激進化，開始建構臺灣民族主義以對抗



中國民族主義。相對於中國民族主義將華語視爲民族語言，臺灣民族主義則將「臺語」（通常指閩南語）視爲民族語言。在第二波反對運動的場合中，無法以「臺語」進行演講的講者只得先向群眾道歉，說明國民黨的語言政策使他們無法用「臺語」演講。本省籍反對運動者若不遵守這項語言規範，群眾往往用噓聲、叫囂、騷動或離開會場的方式表達抗議。<sup>5</sup> 蕭阿勤（2012）認爲，復興臺灣本土語言的種種努力，構成臺灣民族主義的重要部分。那麼，民族認同如何影響家庭語言的選擇呢？這仍有待分析。

社會學者也非常關心語言能力對於社會階層或地位取得的影響。Bourdieu（1991）提出「語言資本」（linguistic capital）的概念。根據他的說法，語言不只是一種溝通技能，更是資源掌控者用來區隔其他階級而壟斷利益的資源。語言資本的分配因階級而不均，而且會一代傳一代，在歷史過程裡一再被複製。

國外已有大量實證研究指出，對於少數族群或移民而言，使用主流語言的能力可提升其勞動市場成就或社經地位（McManus, Gould and Welch 1983; Tienda and Neidert 1984; Neidert and Farley 1985; Evans 1987; Dustmann 1994; Portes and MacLeod 1996; Mouw and Xie 1999; Shields and Price 2002; Smits and Gunduz-Hosgor 2003; Rooth and Ekberg 2006）。臺灣的情況與西方國家略微不同。藉由國家力量，少數族群帶來的華語反而凌駕最大族群的閩南語。不過，即使是外來語，一旦建立優勢地位，同樣能提高人們的社經地位。蔡淑玲（2001）證實，華語愈流利的人，職業地位愈高。此外，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有清楚的階序：閩南語的工作領域是一個「壞」的勞動市場，華語的工作領域則是

---

<sup>5</sup> 大約10年前，筆者參加228紀念活動時，仍可見到這種場面。當辜寬敏在臺上講起華語，臺下群眾立刻鼓譟：「臺灣人講臺灣話！」

一個「好」的勞動市場。陳婉琪、溫郁文（2010）再次證實，華語能力對於脫離勞動階級、取得較高職業地位有顯著正向影響。不過，他們也發現閩南語能力對於成為小僱主的機會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一旦考慮亟需人脈的大僱主身分，華語與閩南語都具有顯著正面影響。由此可見，閩南語作為臺灣最大族群的語言，在某些領域仍可與華語分庭抗禮。

這兩個研究探討的都是工作上的語言能力。然而，一個能夠在工作場域說流利華語的人，未必會把華語帶回家裡。由此可見，家庭語言在臺灣社會學界仍是一個有待討論的議題。此外，上述研究關心的都是語言能力如何影響社會階層。反之，社會階層如何影響家庭語言的選擇，也尚待研究。

## （二）社會語言學研究

相較於社會學者關心語言對社會的影響，語言學者更關心社會對語言的影響。社會語言學的開創者William Labov認為啟動語言變化的因素有兩個方面，其一為語言內在結構的壓力（Labov 1994）；其二為社會因素，特別是年齡、性別與社會階級（Labov 2001）。

若個人的語言隨著生命軌跡轉變，但是社群的語言保持不變，稱為「年齡級差」（age-grading; Labov 2001: 76）。這通常是因為壯年人承受最大的社會壓力，修正自己的發音以迎合優勢音。等到他們退休以後，又回歸鄉音。反之，若個人的語言變化不大，但是社群的語言發生轉變，稱為「世代變遷」（generational change; Labov 2001: 76）。在這種情況下，老年層保有舊的語言型式、青年層使用新的語言型式（Holmes 1992）。由於臺灣面臨快速的語言轉移與語音變化，幾乎

所有社會語言學研究都指出世代變遷，但鮮少指出年齡級差。例如，在臺灣的泉腔方言區，老年層仍有較高比例保有央元音：ə、i。但是愈年輕的人們愈不會說央元音，轉而使用漳腔的e、ue、u、i（洪惟仁 2003a）。<sup>6</sup> 反之，泉腔的「入歸柳」（j音變爲l）則取得優勢，入侵漳腔地盤。在漳腔方言區，老年層仍保有j-；愈年輕的人們愈傾向說成l-（洪惟仁 2012）。<sup>7</sup> 泉腔與漳腔互相滲透之後，形成不漳不泉的臺灣閩南語優勢腔，侵蝕各地方言。例如，臺南關廟方言極具特色的「出歸時」（ts音變爲s）<sup>8</sup> 隨著年齡層降低而快速流失（陳淑娟1995；簡秀梅與洪惟仁 2007）。其他如桃園大牛欄方言（洪惟仁 2003b；陳淑娟 2004）、汐止方言（洪惟仁 2004）、鹿谷及安平方言（陳淑娟 2010）的研究皆顯示，愈年輕的人們愈向優勢音靠攏。

大多數社會語言學研究均顯示女性偏好使用標準的、優勢的語言，Labov（2001: 266）稱爲「女性的語言順從」（linguistic conformity of woman）。有一種解釋是：女性對於社會地位比男性更爲敏感，傾向透過優勢語言表現出比實際更高的地位。另一種解釋是：社會期待「好」的女性說話很「標準」，但是可以容忍男性說話不「標準」。此外，女性居於從屬地位，也會有意或被要求謹慎地、禮貌地說話，以免冒犯男性（Holmes 1992）。黃宣範（1993）根據一份1988年的問卷調查，指出臺灣女性比男性更加認爲「國語比方言還要優美、文雅、有水準」。此外，黃宣範（1993）在中壢、楊梅進行的調查顯示，無論客家人還是福佬人，女性在家中都比男性更常說華語、更少說母語。陳淑娟

<sup>6</sup> 例如，「短」由tə轉向te、「火」由hə轉向hue、「自」由tsi轉向tsu、「豬」由ti轉向ti。

<sup>7</sup> 例如，「日」由jit變成lit、「二」由ji變成li。

<sup>8</sup> 有人因而取笑關廟人買菜（tsai）是買屎（sai），買紅菜是買翁婿（老公）。

(2004) 針對桃園大牛欄方言社群的調查亦顯示，女性在心態上比男性更嚮往優勢音。不過，由於女性的社會網絡比男性更侷限於當地，接觸優勢音的機會較少。兩個因素互相抵銷後，語音未出現顯著的性別差異。

相較於年齡與性別，臺灣語言學界很少討論社會階級的影響。例外之一是簡秀梅與洪惟仁(2007)針對關廟方言社群的調查。他們發現白領階層比藍領階層更快轉向優勢音。

顯而易見，語言學者對於語音變化的關心遠多於語言轉移。同時，語言學者通常以具有特色的方言為研究對象，缺乏全國性的調查研究。一個罕見的例外是Young(1989)宣稱以全國性樣本分析臺灣的語言維持與轉移。他的調查顯示，女性比男性常使用華語、年齡愈小的人們愈常使用華語、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們愈常使用華語、按月收入劃分的社經地位與語言使用無關。不過，這份調查於1986年進行，距今已經30年了。而且，其樣本並非真的具有全國代表性。Young採用兩階段抽樣設計，第一階段選出一個小型客家聚落(麟洛)、三個小型閩南聚落(羅東、壯圍、冬山)、一個中型客家市鎮(苗栗)、一個中型閩南市鎮(新營)、與五個大型都會核心(臺北市、高雄市、臺南市、臺中市、新竹市)。他的第二階段並未按照上述行政區的人口分配樣本數，顯然是方便取樣。結果，樣本中只有50.2%是福佬人，但有26.1%是客家人，明顯偏離臺灣人口結構。<sup>9</sup>

---

<sup>9</sup> 根據1966年人口普查，臺灣(不含金門、馬祖)的族群結構為福佬人71.2%、客家人12.1%、外省人14.6%、原住民2.0%。

### （三）從衆與鄰近效應

人們如何說話，反映他們鑲嵌在什麼樣的社會網絡中。爲人父母者通常會明白這個道理，當他們的小孩上學之後改口說同儕的話，而不再說父母的話（Holmes 1992）。由於社會網絡傾向同類相聚（homophily），同性別、同年齡層或同階級的人們，言語也會趨同。這部分解釋了性別、年齡與階級等社會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受限於移動能力，大多數人的社會網絡是地方化的。亦即，人們最常跟周遭人講話，因此產生向周遭語言趨同的動力。理論上，人們出外時才需要講當地的優勢語言；在家裡可以講另一種話。但是，這有如逆水行舟，相當辛苦。員林、埔心、永靖的客語家庭在閩南語的包圍之下，已消失殆盡；西螺、二崙、崙背的客語家庭也在閩南語的包圍之下，日漸萎縮（黃宣範 1993；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 2012）。桃園大牛欄方言則是被客語包圍的閩南語島。當地家族採取在家裡講閩南語、出外講客語的策略，努力維持一段時間後，姜氏、羅氏終究難以爲繼，轉變爲客語家族。葉氏、黃氏尚未放棄閩南語，原因是他們的分布比較集中（陳淑娟 2004）。

隨著交通與通訊技術的革新，人們不僅移動範圍愈來愈大，還能夠進行遠距離的交談。這是否意味著，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鄰近效應）在現代社會中已無關緊要？誠然，強連帶（親人、摯友）能夠突破距離的限制。但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周遭，依然存在大量弱連帶（鄰居、商家、泛泛之交），持續提供交談機會。甚至，由身旁不特定陌生人發出

的背景音，也足以影響人們對於語言勢力強弱的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實驗早已證實，人們傾向順從周遭人的主流意見，即使他們沒有交情（Asch 1956）。當人們的語言在環境中居於少數時，容易產生焦慮感。對於家中有小孩正在學習的人們而言，尤其如此。<sup>10</sup> 因此，即使強連帶無遠弗屆，家庭語言依然有順從地方主流的壓力。另一方面，在人際溝通這項功能上，愈多人使用的語言愈有用。此種特性稱為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會導致強勢者愈強勢（Economides 1996）。因此，當一種語言在人們的耳邊愈盛行時（即使只是背景音），會使人們覺得這種語言愈有用，進而提高意願教導小孩說這種語言。

總而言之，家庭語言的選擇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也受到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客家委員會的調查提供一個初步證據：居住在客家鄉鎮的客家民衆，有72.9%在家裡講客語；居住在非客家鄉鎮的客家民衆，只有35.3%在家裡講客語（客家委員會 2011: 91）。不過，這個數據並未考慮兩種客家民衆的年齡與階級組成可能存在差異。更嚴謹的鄰近效應證據需要控制其他社會因素，但這是目前仍然欠缺的。

#### （四）小結與推論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社會學界尚未處理家庭語言選擇的議題；臺灣語言學界關心語音變化遠多於語言選擇，且缺乏全國性的調查研究。爲了彌補這些空白，本研究根據可代表臺灣人口的調查資料以及嚴謹的統計方法，估計各種社會因素與周遭語言環境對於家庭語言

---

<sup>10</sup> 筆者對於這一點有深刻感受。我們家人跟小孩講閩南語。但是每當我的母親帶著我的小孩到鄰近的學校、公園玩耍，發現別人家的大人都跟小孩講華語時，就會相當焦慮，懷疑還要不要跟孫子講閩南語。注意，那些別人家都是陌生人。

選擇的淨效果。

首先，族群是決定家庭語言的首要因素。如同第一節的討論，福佬人最可能在家裡說閩南語，客家人最可能在家裡說客語，外省人最可能在家裡說華語。<sup>11</sup> 若福佬人或客家人與其他族群通婚，很可能因為對方不懂閩南語或客語而轉以華語為家庭語言。王甫昌（1994）發現華語流利的福佬人或客家人較容易跨族群通婚。事實上，這個統計關聯也可以解讀為：跨族群通婚的福佬人或客家人較常說華語，因而流利。性別方面，如同社會語言學的典型模式，女性更傾向使用優勢的華語。再者，隨著閩南語、客語日漸衰微，愈年輕的世代愈傾向使用優勢的華語。教育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臺灣的教育體制不僅以華語傳播知識，還透過華語篩選誰能夠升學。因此，學歷愈高的人愈可能在家裡說華語。以上這些因素都不會讓人感到意外，在本研究中視為基本的控制變項。我更重要的目標是釐清尚未明瞭的社會階級與民族認同的作用，以及估計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鄰近效應）有多強。

蔡淑玲（2001）、陳婉琪與溫郁文（2010）皆證實華語能力有助於人們取得較高地位。如同經濟資本，語言資本也可以傳承給下一代。而傳承語言資本的捷徑不外乎讓下一代從小在家說優勢語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受益於語言資本而獲得較高社經地位的人，更傾向於在家裡使用華語。不過，陳婉琪、溫郁文（2010）也發現閩南語能力有助於人們成為僱主。由此可見，僱主與受僱者有必要分開處理，這比較符合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首先，按照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可區分所有者與受僱者兩類。所有者當中，僱用員工的是「僱主」，未僱用員工的是「自營作業者」。受僱者當中，擁有管理權或專業技術者合稱「新中產階級」，其餘為「非技術工人」（林宗弘 2009；2013）。基於工具性的理

<sup>11</sup> 由於原住民數量在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中太稀少，本文暫不討論原住民。

由，階級將引導人們選擇何種語言傳承給下一代。

**階級區隔命題：**受益於華語而獲得較高地位的受僱者——新中產階級，為了延續其相對優勢，最可能跟小孩說華語。

王甫昌（1996）與蕭阿勤（2012）共同指出，中國民族主義將華語視爲促進中華民族團結的必要條件，試圖消滅其他本土語言。與其對抗的臺灣民族主義則試圖復興臺灣本土語言。基於情感性的理由，民族認同將引導人們選擇何種語言傳承給下一代。

**政治社會化命題：**中國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臺灣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臺灣本土語言。

最後，家庭語言的選擇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也受到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人們最常跟周遭人講話，因此產生向周遭語言趨同的動力。即使強連帶能夠突破距離限制，基於從衆與網絡外部性，家庭語言依然有順從地方主流的壓力。雙親族群、性別、世代、教育程度、階級、民族認同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一旦生活在不同的語言環境裡，可能做出不同的語言選擇。

**鄰近效應命題：**居住地的華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華語；居住地的閩南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閩南語。

### 三、臺灣家庭語言現況

#### （一）資料

本研究同時採用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個體資料的來源爲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第六期第四次國家認同組）。這是一份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機率樣本，調查方法參見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



培珊（2014）。由於樣本中原住民與新移民的數量太少，我只分析雙親爲福佬人、客家人或外省人的受訪者。

本研究分析的第一道題目爲：「請問您在家裡最常講國語、臺語（閩南語）、客家話，還是哪一種語言呢？」爲了捕捉最常用的一種語言，訪員只唸出「國語」（華語），「臺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語」等四個選項，請受訪者選一種。當受訪者堅持有兩種以上時，才開放複數語言選項（傅仰止等人 2014: 98-99）。由於純粹使用客語的人數太少，我將回答「客家話」、「國語、客家話都有」、「國語、臺語（閩南語）、客家話都有」者合併爲「包含客語」。

不過，這道題目無法區別受訪者的講話對象是誰。衆所周知，人們跟長輩講閩南語或客語、跟子女講華語，是很普遍的事情。因此，更有價值的一道題目是：「請問在家裡，您最希望您的小孩跟您說哪一種話？」選項包括：「國語」（華語）、「臺語（閩南語）」、「客家話」、「其他」。若受訪者沒有小孩，則請受訪者假想有小孩的情況。選擇「其他」的受訪者，大多數在未提示的情況下自行提出華語、閩南語並用。這一題偵測人們對於母語的忠誠度，更能夠預測家庭語言的未來。

上述調查資料只涵蓋58個鄉鎮區，無法完整呈現家庭語言的地理分布。因此，本研究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掌握家庭語言的地理分布。<sup>12</sup> 這次「人口普查」詢問6歲以上民衆在家裡使用哪些語言，選項包括：「國語」（華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族語」、「其他」。不像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要求受訪者選出最常說的一種語言，2010年「人口普查」採取最寬鬆標準，只要是會講的語言都可以

---

<sup>12</sup> 雖然號稱「人口普查」，2010年只抽出16%普查區進行調查。不過，這樣的樣本已遠大於其他任何調查資料，而且可以涵蓋所有鄉鎮區。

選。因此，來自這份資料的各地「華語盛行率」、「閩南語盛行率」、「客語盛行率」只反映「能說」的情形，不是「最常說」的情形，必須留意。

## （二）族群

圖1呈現父母族群組合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毫無意外，父母都是福佬人的受訪者最常說閩南語（56.0%）。父母都是客家人的受訪者，其家庭語言最可能包含客語（45.4%）。外省家庭與各種跨族群通婚的家庭，大多以華語為家庭語言。

人們最想跟小孩說的語言與其在家裡最常說的語言大同小異。父母都是福佬人的受訪者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53.2%）。父母都是客家人的受訪者最想跟小孩說客語（43.7%）。來自外省家庭或各種跨族群通婚家庭的受訪者，大多傾向跟小孩說華語。值得注意的是，在福佬、客家的組合中，父親為福佬人比母親為福佬人更容易傳承閩南語（25.0%：17.5%）；父親為客家人比母親為客家人更容易傳承客語（7.5%：2.1%）。同樣的道理，在福佬、外省的組合中，父親為福佬人比母親為福佬人更容易傳承閩南語（31.3%：15.2%）。如此看來，家庭語言與其說是母語，更可能是「父語」。究其原委，臺灣的婚姻型態多為從夫居，因此母系語言比父系語言更容易失去原生語言社群的支持。<sup>13</sup>

---

<sup>13</sup> 根據2012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社會階層組，已婚女性有3.7%與父親或母親同住、19.9%與公公或婆婆同住；已婚男性有23.0%與父親或母親同住、1.6%與岳父或岳母同住。若考慮許多年長女性的公婆已亡故，或公婆雖未同住但住在附近，應有超過19.9%的已婚女性曾與夫家親屬經常接觸。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學會配偶原生家庭的語言，進而傳承給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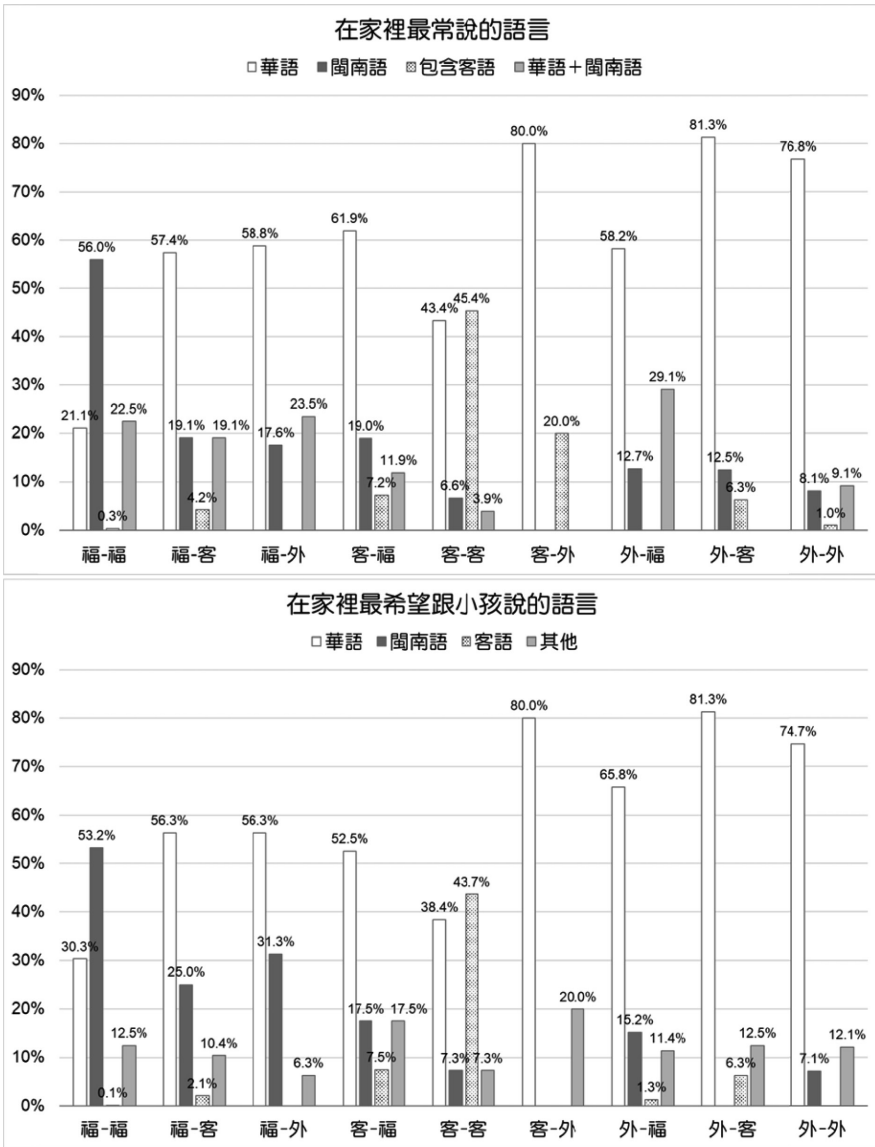


圖1 父母族群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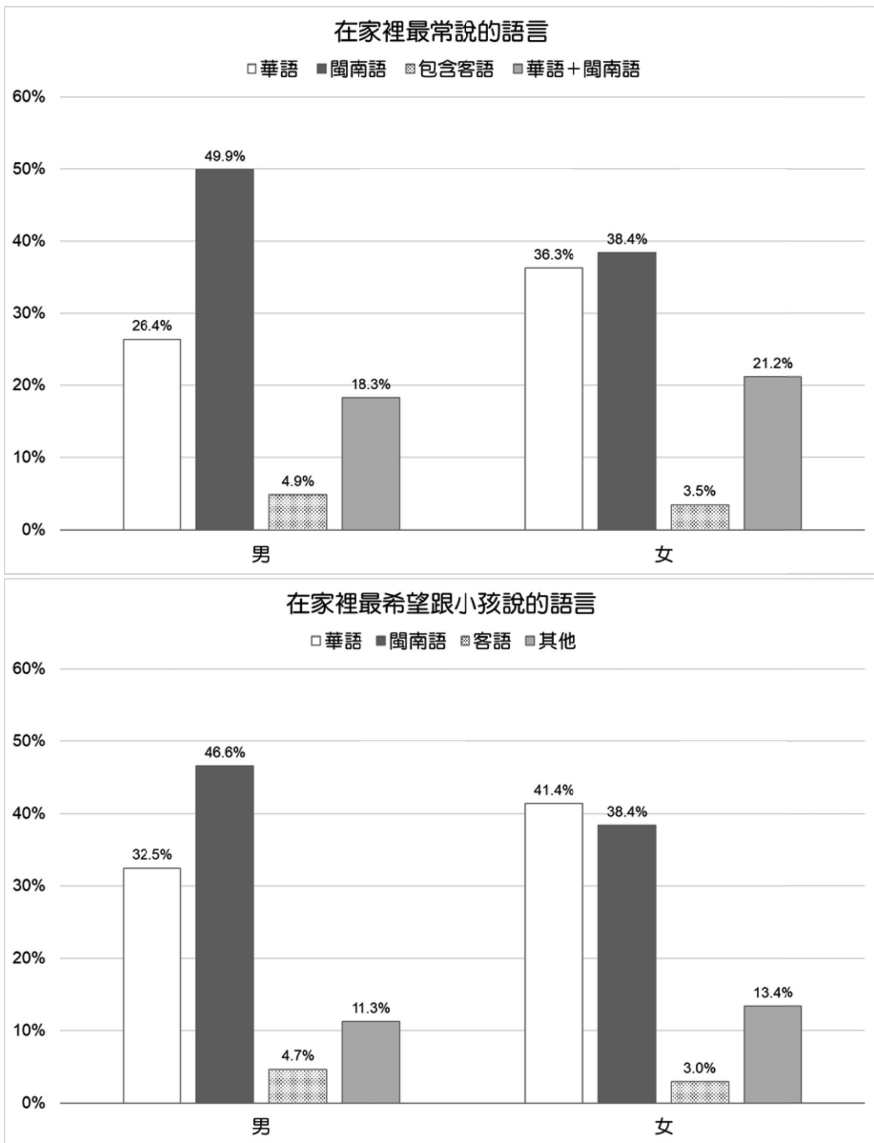


圖2 性別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 （三）性別

圖2呈現性別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如同社會語言學的典型模式，女性比男性更傾向說優勢的華語（36.3%：26.4%），少說閩南語或客語。同樣地，女性也比男性更偏好跟小孩說華語（41.4%：32.5%），少說閩南語或客語。

### （四）年齡層與世代

橫剖面資料中的年齡層同時也是世代。因此，資料本身無法區別年齡級差與世代變遷。<sup>14</sup> 不過，將資料放在社會脈絡中解讀，還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斷。經歷半個世紀獨尊華語、打壓本土語言的國家干預後，閩南語、客語日漸衰微。因此，老年層傾向閩南語或客語、青年層傾向華語的現象，主要來自世代變遷而不是年齡級差。如果考慮從小說閩南語或客語的人們可能隨著年齡增加而愈來愈熟練華語，部分抵銷了老年層傾向閩南語或客語的趨勢。如此，我們對於世代差異的評估是保守的，而不是誇大的。

按照成長背景的差異，本研究將臺灣民衆區分為6個出生世代，分別是：出生於1945年以前的戰前世代；出生於1946-1955年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於1956-1965年，開始接受九年華語教育的世代；出生於1966-1975年，成長時本土語言遭強力壓制的世代；<sup>15</sup> 出生於1976-1985

<sup>14</sup> 200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也曾詢問家庭語言，但主動提供「一半一半」選項。2013年的調查則不主動提供此選項。由於問法不同，很遺憾無法進行跨期分析。

<sup>15</sup> 1970年，電視布袋戲改用華語發音；1972年，教育部明令臺語節目應當減少；1976年施行的《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明文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應用國語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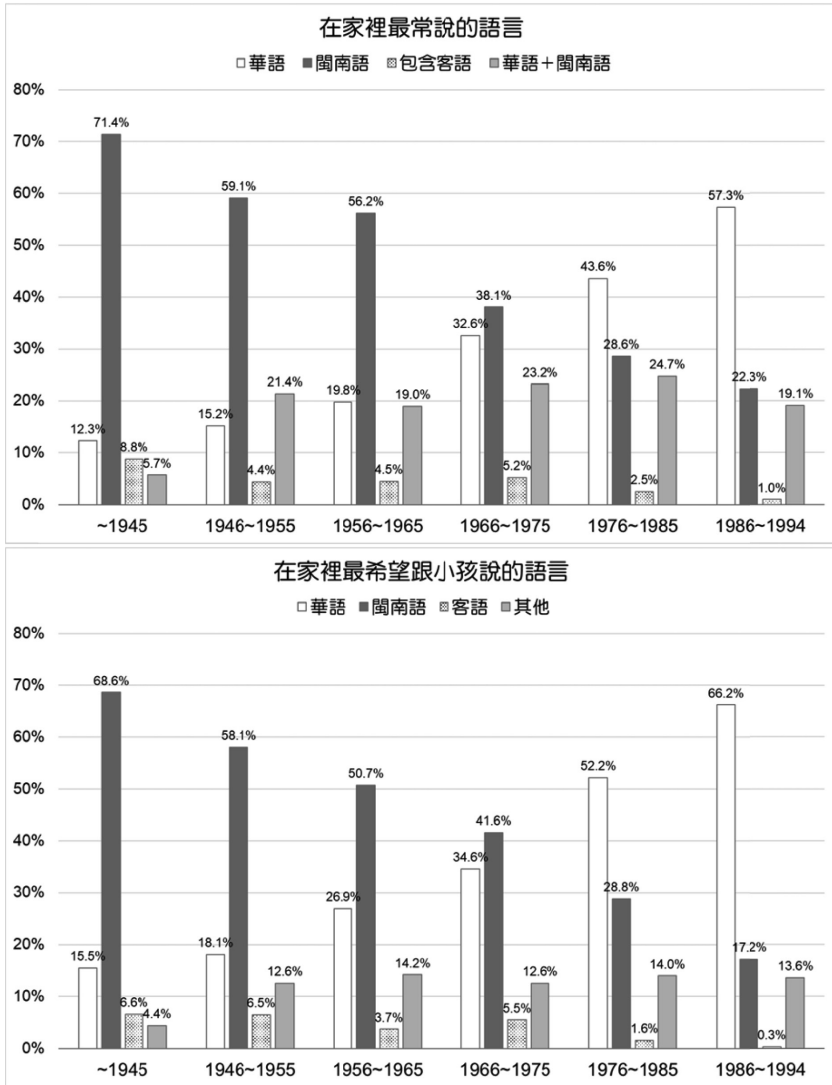


圖3 出生世代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音的比例，廣播電臺不得少於55%；電視電臺不得少於70%。使用方言應逐年減少。」1980年，新聞局長宋楚瑜宣布：電視臺語節目將逐漸減少，至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參見：蕭阿勤（2012: 241-242）。

年，其父母受過華語教育的戰後第二代；以及出生於1986-1994年，開始接觸「鄉土語言」課程的世代。<sup>16</sup>

圖3呈現2013年時出生世代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如同預期，愈年輕的世代，說華語的比例愈來愈高、說閩南語的比例愈來愈低。成長時本土語言遭強力壓制的1966-1975年出生世代，閩南語流失速度最快。這個世代最常說閩南語的比例，比上一個世代少了18.1%（56.2%→38.1%）。1976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其父母都能說華語，因此華語人口超越閩南語人口。1986年以後出生的世代雖然開始接觸「鄉土語言」課程，但已經止不住閩南語、客語衰微的動量了。

觀察人們最想跟小孩說什麼語言，可發現閩南語與客語的未來命運更悲觀。2013年時，「鄉土語言課程世代」最常說華語的比例為57.3%，但有66.2%最想跟小孩說華語。這個世代最常說閩南語的比例還有22.3%，但只剩17.2%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換言之，這個世代的下一代講閩南語的比例還會更低。更嚴重的是，「鄉土語言課程世代」有52名受訪者為客家人的子女（包含父母只有一方為客家人），其中只有1人最想跟小孩說客語。鍾肇政的擔憂顯然不是杞人憂天。

## （五）教育程度

圖4呈現教育程度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如同一般常識，學歷愈高的人們在家裡說華語的比例愈高、說閩南語的比例愈低。交叉點落在高中職與專科<sup>17</sup>之間。高中職以下學歷，閩南語人口多於華語人口；專

<sup>16</sup> 1993年，國小課程開始增列「鄉土語言」。

<sup>17</sup> 近年來，大量專科學校改制為科技大學，容易導致畢業時學歷還是專科的受訪者將學歷說成科技大學。因此，本研究將科技大學併入專科而不是大學。事實上，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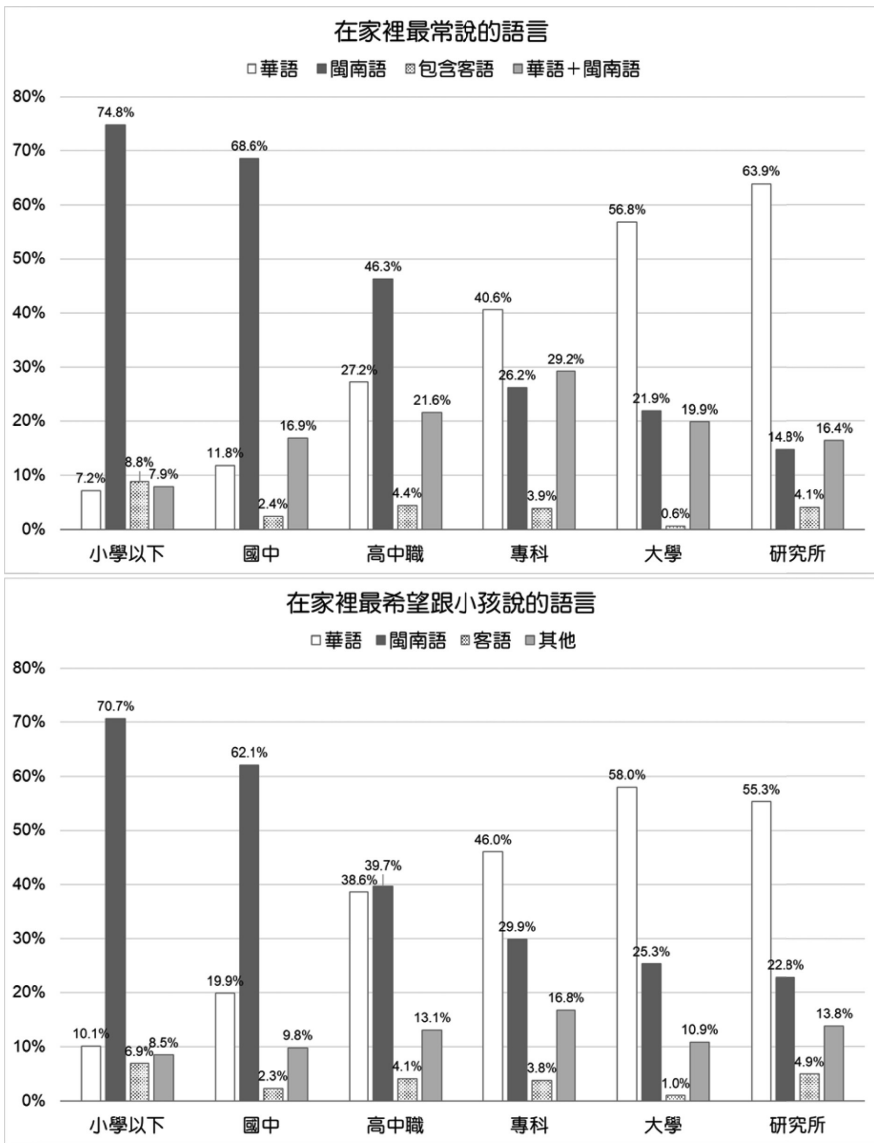


圖4 教育程度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技大學與大學確實不太一樣。大學畢業者比前者更傾向華語。



科以上學歷，華語人口多於閩南語人口。

人們最想跟小孩說的語言也隨著學歷提高而傾向華語，但是趨勢比前者（最常說的語言）和緩。例如，國中學歷者最常說華語的比例為11.8%，但有19.9%最想跟小孩說華語；最常說閩南語的比例為68.6%，只有62.1%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碩博士則是鮮明的對比：他們最常說華語的比例為63.9%，只有55.3%最想跟小孩說華語；最常說閩南語的比例為14.8%，卻有22.8%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這意味著，有些低學歷者不常說華語，但渴望透過轉用華語讓下一代翻身；有些高學歷者不常說閩南語，卻希望下一代挽回流失的母語。<sup>18</sup> 後者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回頭轉移」現象。只不過，回頭轉移的幅度小於第一階轉移，並未扭轉學歷愈高愈傾向優勢語言的趨勢。

## （六）階級

根據簡化的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林宗弘 2009；2013），受訪者先區分生產工具所有者與受僱者兩類。所有者當中，再區分僱用員工的「僱主」與未僱用員工的「自營作業者」兩個階級。受僱者當中，管理其他員工或國際職業分類屬於「行政主管及經理人」、「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者，合稱「新中產階級」。其餘受僱者皆歸入「非技術工人」。已離開工作職場的受訪者，按其離開前的職業進行分類。

圖5呈現階級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新中產階級確實是最常說華

---

<sup>18</sup>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支持上述推論。國中學歷者有4.0%最常說華語但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7.1%最常說閩南語但最想跟小孩說華語；碩博士有10.6%最常說華語但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4.1%最常說閩南語但最想跟小孩說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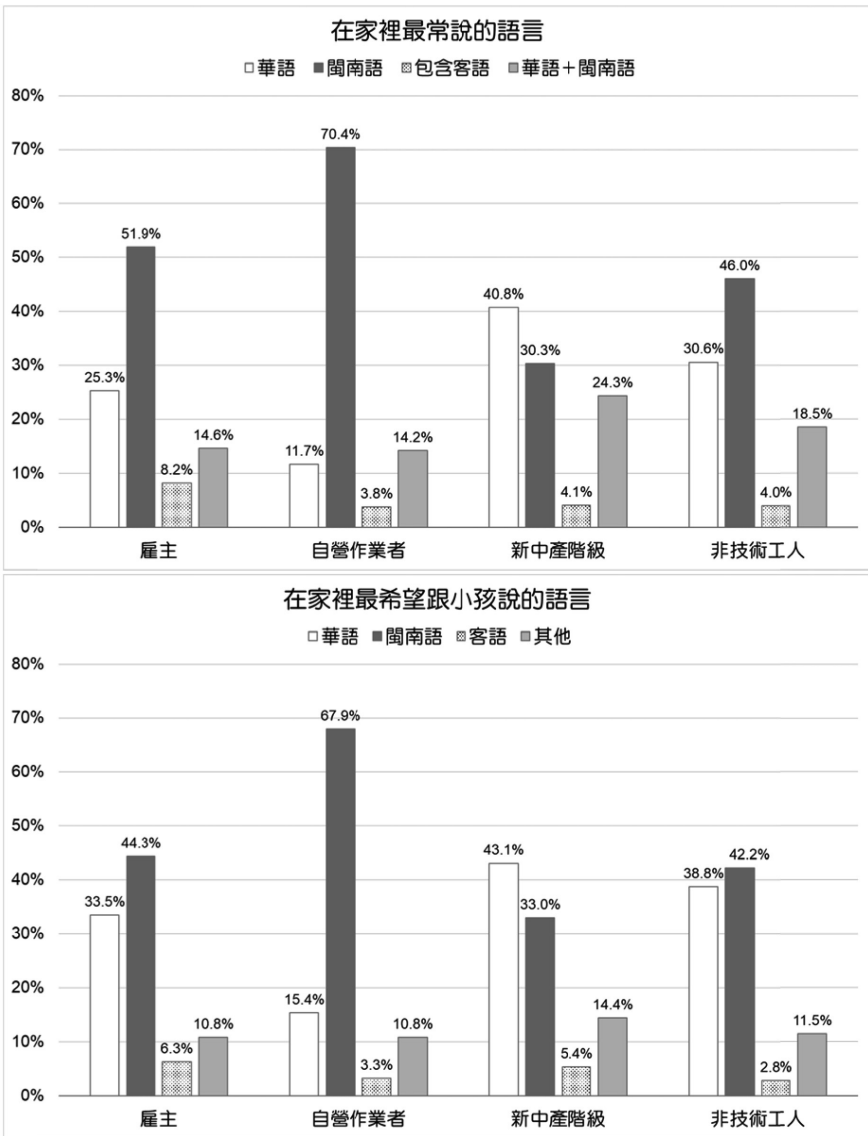


圖5 階級與家庭語言的交叉分析

語（40.8%）且最偏好跟小孩說華語（43.1%）的一群人，符合階級區隔命題。包括小商販、手作師傅、農民的自營作業者仍然生活在閩南語的世界裡（70.4%）；僱主也比受僱者更常說閩南語。不過，上述觀察尚未控制性別、年齡／世代、教育程度等因素。新中產階級的教育程度最高，而教育提高人們說華語的機率。僱主與自營作業者的年齡偏高、男性較多，而高齡男性本來就傾向說閩南語。究竟階級對家庭語言的淨效果爲何，得透過第四節的多變量迴歸分析加以釐清。

## （七）地理分布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圖6、圖7、圖8分別描繪各鄉鎮區6歲以上人口在家裡使用華語、閩南語、客語的比例，亦即「華語盛行率」、「閩南語盛行率」、「客語盛行率」。注意，這份調查採取最寬鬆的標準，反映的只是「能說」而不是「最常說」的情形。

首先，山地原住民鄉盡是華語天下。<sup>19</sup>再者，從臺北延伸到新竹的大都會帶，以及臺中都會區，華語盛行率也大多超過九成。相較之下，臺南、高雄都會區的華語盛行率沒有中北部都會區那麼高。苗栗縣以及從彰化縣延伸到屏東縣的非都會區，華語盛行率最低，通常未滿70%。

閩南語的分布幾乎與華語分布相反。在山地原住民鄉，新竹縣、苗栗縣的客家鄉鎮，閩南語盛行率非常低。從臺北延伸到新竹的大都會帶中，除了中南部移民集中的淡水河左岸（三重、蘆洲）與大漢河流域（板橋、土城、新莊、樹林一帶），閩南語盛行率普遍不及八成，低於華語盛行率。臺中市區的閩南語盛行率未滿九成，也低於華語盛行率。

---

<sup>19</sup> 除了屏東縣霧臺鄉與來義鄉，其他山地原住民鄉的華語盛行率都超越原住民族語盛行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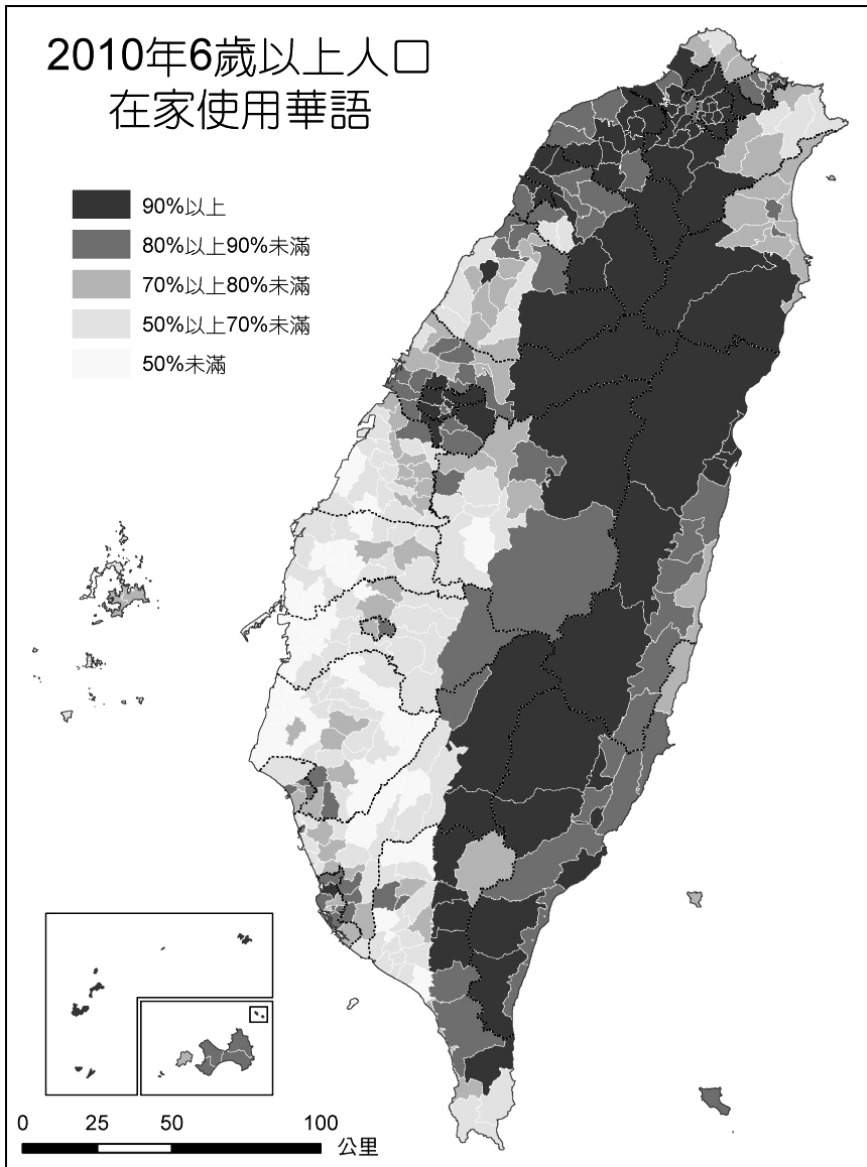


圖6 華語盛行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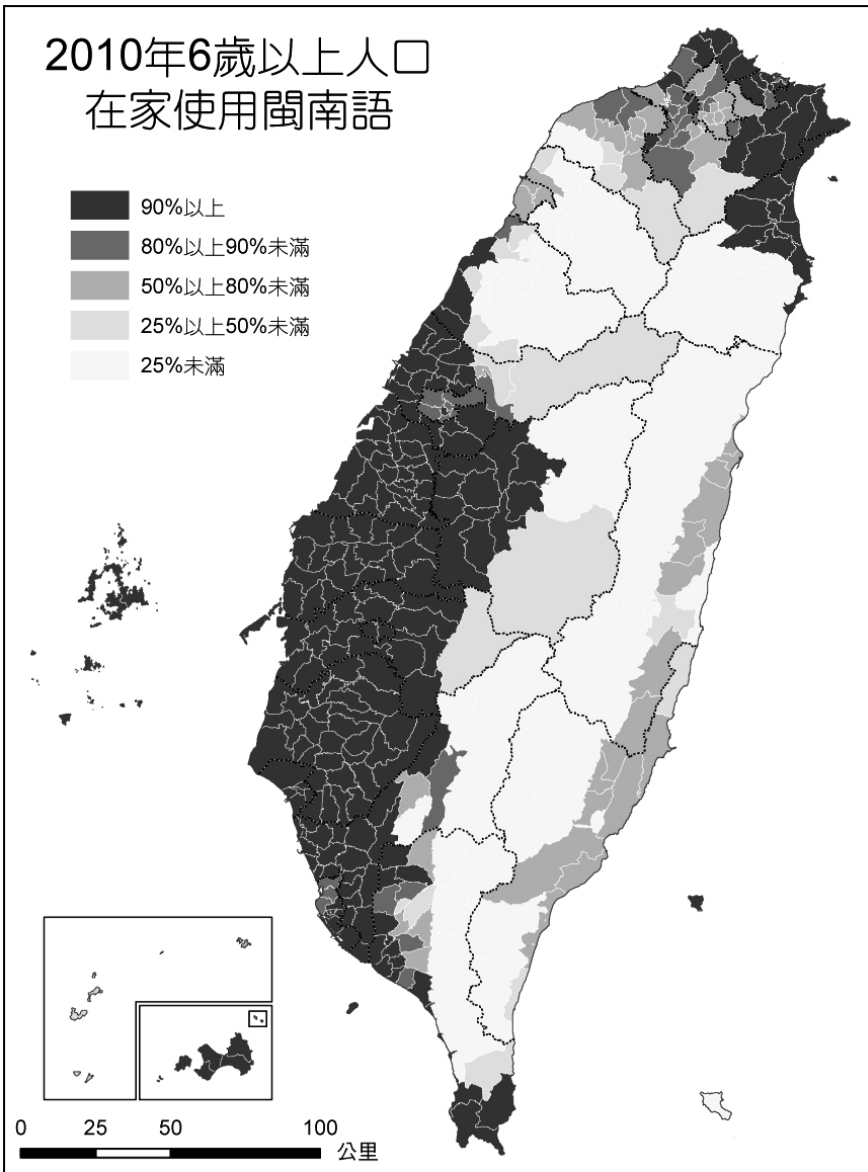


圖7 閩南語盛行率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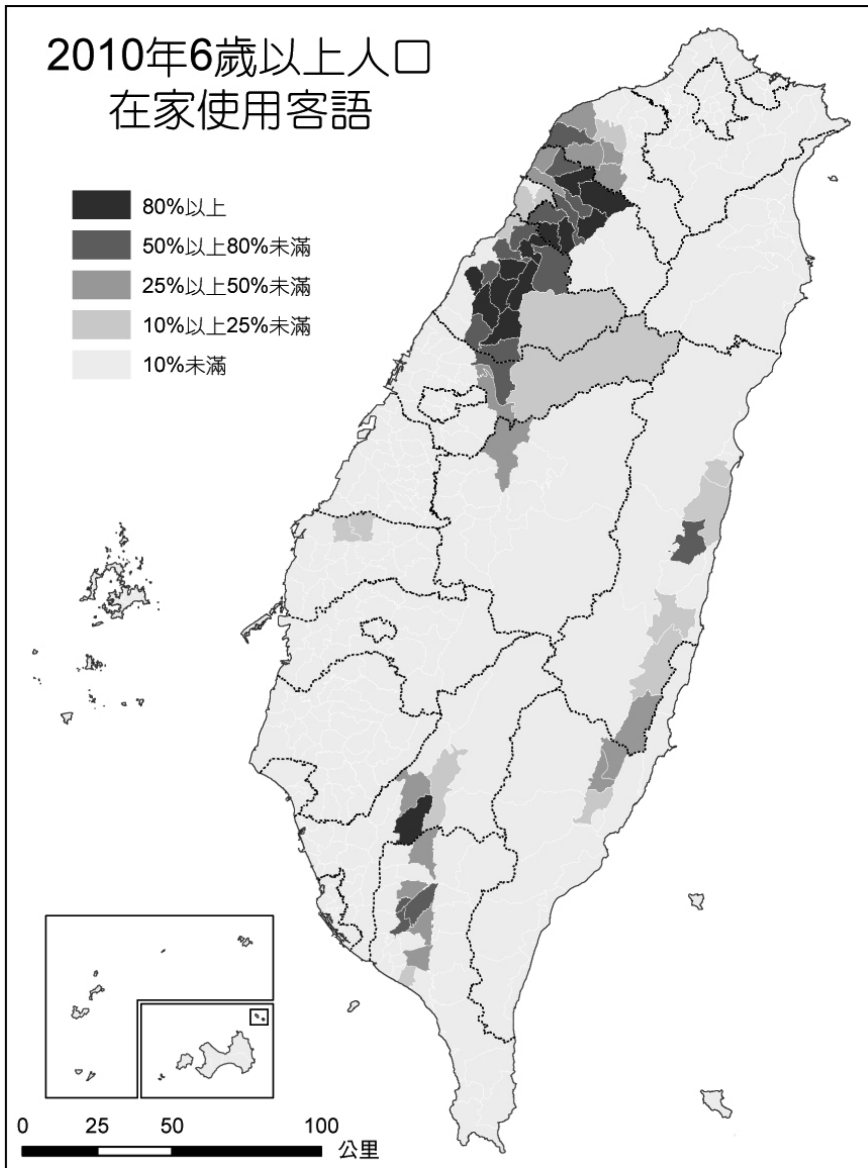


圖8 客語盛行率分布

除此之外，東北角與宜蘭地區，以及從苗栗海線延伸至臺灣最南端的廣大區域，仍有九成以上人口在家裡能說閩南語。不過，這不表示他們最常說閩南語，再次提醒。

客語只在新竹縣、苗栗縣的客家鄉鎮以及美濃取得優勢。傳統上被視為客家區域的桃園縣南部，除了新屋鄉，能說客語的人口已不到一半。前面提到的大牛欄方言社群即位於新屋鄉。當地的姜氏與羅氏剛從閩南語家庭轉成客語家庭，旋即又開始向華語轉移了（陳淑娟 2004）。鍾老的故鄉——龍潭，只剩下31.7%人口能在家裡說客語。

## 四、迴歸分析

### （一）選擇華語的因素

根據上一節的觀察，來自外省家庭或跨族群通婚家庭、女性、愈年輕的世代、學歷愈高的人們，都更傾向在家裡說華語。接下來，我將在同時考慮上述因素的條件下，透過迴歸分析釐清階級、民族認同對家庭語言的影響。<sup>20</sup>

M1-1與M1-2的被解釋變項為「在家裡最常說華語」（表1）。這是一個二元變項，因此這兩個模型都是二元邏輯迴歸模型。由於階級與教育程度有關，M1-1先不考慮教育程度，M1-2才加入教育程度，目的是觀察階級的迴歸係數如何改變。M1-1的估計結果再一次確認第三節的觀

---

<sup>20</sup> 有三種跨族群組合的受訪人數太少（父福佬—母外省17人、父客家—母外省5人、父外省—母客家16人）。既然各種跨族群組合都傾向說華語（圖1），為了獲得較穩定的迴歸估計，跨族群的分類予以簡化，只區分「福佬—客家」、「福佬—外省」、「客家—外省」。

察：來自外省家庭或各種跨族群家庭者、女性、愈年輕的世代、新中產階級，都較傾向在家裡說華語。

**表1 選擇華語的迴歸分析**

	最常說華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		
	M1-1	M1-2	M2-1	M2-2	M2-3
雙親族群（對照組：福佬）					
福佬+客家	1.515** (0.256)	1.583** (0.268)	0.649** (0.248)	0.659** (0.251)	0.624** (0.250)
福佬+外省	1.613** (0.239)	1.483** (0.244)	1.221** (0.237)	1.077** (0.238)	0.971** (0.241)
客家	1.429** (0.202)	1.508** (0.212)	0.517** (0.197)	0.501* (0.200)	0.415* (0.202)
客家+外省	2.761** (0.620)	2.610** (0.618)	2.090** (0.611)	1.918** (0.604)	1.668** (0.602)
外省	3.265** (0.291)	3.071** (0.297)	2.406** (0.268)	2.175** (0.270)	2.004** (0.285)
女性	0.568** (0.122)	0.630** (0.128)	0.499** (0.112)	0.532** (0.114)	0.539** (0.116)
出生世代（對照組：1945以前）					
1946~1955	0.466 (0.326)	-0.049 (0.362)	0.302 (0.273)	-0.059 (0.292)	-0.099 (0.306)
1956~1965	0.946** (0.306)	0.329 (0.357)	0.865** (0.252)	0.348 (0.286)	0.377 (0.298)
1966~1975	1.578** (0.297)	0.623 (0.352)	1.213** (0.248)	0.464 (0.288)	0.460 (0.299)
1976~1985	2.055** (0.299)	0.861* (0.358)	1.883** (0.251)	1.023** (0.294)	1.030** (0.305)
1986~1994	2.831** (0.309)	1.460** (0.370)	2.676** (0.265)	1.706** (0.311)	1.786** (0.323)
教育程度（對照組：小學以下）					
國中		0.201 (0.415)		0.378 (0.309)	0.338 (0.322)
高中職		1.280** (0.346)		1.201** (0.270)	1.253** (0.281)
專科		1.752** (0.363)		1.265** (0.291)	1.298** (0.301)



	最常說華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		
	M1-1	M1-2	M2-1	M2-2	M2-3
大學		2.450** (0.370)		1.663** (0.301)	1.675** (0.311)
研究所		2.865** (0.412)		1.650** (0.344)	1.702** (0.354)
階級（對照組：非技術工人）					
僱主	0.271 (0.248)	0.037 (0.259)	0.454* (0.214)	0.287 (0.220)	0.316 (0.224)
自營作業者	-0.280 (0.250)	-0.275 (0.265)	-0.361 (0.212)	-0.318 (0.218)	-0.336 (0.224)
新中產階級	0.519** (0.134)	-0.108 (0.152)	0.253* (0.125)	-0.069 (0.139)	-0.089 (0.140)
臺灣人認同					-0.034 (0.036)
中國人認同					0.054** (0.017)
常數	-3.406** (0.295)	-3.813** (0.347)	-2.496** (0.242)	-2.825** (0.274)	-2.825** (0.274)
Nagelkerke R <sup>2</sup>	0.346	0.408	0.275	0.302	0.309
N	1819	1819	1819	1819	1775

註：括弧內為標準誤。\* p<0.05, \*\* p<0.01

M1-2加入教育程度，結果雙親族群的迴歸係數改變不大。父母皆為外省人者最可能在家裡說華語，其勝算是父母皆為福佬人者的21.6倍（ $e^{3.071}$ ）。<sup>21</sup>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皆為客家人者也比父母皆為福佬人者傾向在家裡說華語。前者勝算是後者的4.5倍（ $e^{1.508}$ ），近似福佬一客家以及福佬一外省的跨族群家庭出身者。這顯示客家人流失客語的幅度比福佬人流失閩南語的幅度更劇烈。考慮教育程度後，出生世代的迴歸係數大幅縮水。原因是愈年輕的世代教育程度愈高，所以世代間的家庭語言差異可由教育程度解釋大半。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條件下，2013年時

<sup>21</sup> 勝算是觀察事件發生機率除以未發生機率。此例為最常說華語的機率除以不是最常說華語的機率。

只有197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傾向在家裡說華語。別忘了，這些人的父母大多受過華語教育。教育程度方面，國中與小學以下沒有顯著差異。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人們，隨著學歷提高而愈來愈傾向在家裡說華語。這固然與華語教育的薰陶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教育篩選的結果。華語能力愈好的人們愈可能通過層層篩選，取得愈高的學歷。而這樣的華語能力同時提高他們在家裡說華語的傾向。最後的觀察重點是階級。一旦考慮教育程度，新中產階級的迴歸係數就不顯著了。換言之，新中產階級之所以傾向在家裡說華語，是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整體而言最高。階級本身，並未對家庭語言產生直接影響。

M2-1、M2-2與M2-3的被解釋變項為「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表1）。這也是一個二元變項，因此這三個模型都是二元邏輯迴歸模型。M2-1同樣不考慮教育程度，M2-2加入教育程度，M2-3再加入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M2-1的估計結果再一次確認第三節的觀察：來自外省家庭或各種跨族群家庭者、女性、愈年輕的世代、新中產階級，都較偏好跟小孩說華語。不過，控制性別與出生世代後，僱主也偏好跟小孩說華語。

M2-2加入教育程度，結果雙親族群的迴歸係數依然改變不大。父母皆為外省人者最想跟小孩說華語，其勝算是父母皆為福佬人者的8.8倍（ $e^{2.175}$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皆為客家人者還是比父母皆為福佬人者偏好跟小孩說華語。前者勝算是後者的1.7倍（ $e^{0.501}$ ）。這再一次證實客語的未來比閩南語更堪憂。考慮教育程度後，出生世代的迴歸係數同樣大幅縮水。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條件下，2013年時只有197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更想跟小孩說華語。他們的下一代（目前尚未成年）也就更不可能說閩南語或客語了。教育程度方面，國中與小學以下依然沒有顯著差異。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人們跟小孩說華語的意願增加。比

較M1-2與M2-2，後者專科、大學、研究所的迴歸係數都小於前者，且學歷愈高減少愈多。這意味著，有些高學歷者出現挽回閩南語或客語的心態。不過，回頭轉移的人數還不足以扭轉學歷愈高愈傾向跟小孩說華語的趨勢。最後，一旦考慮教育程度，僱主與新中產階級的迴歸係數都不再顯著。換言之，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情況下，這些地位較高的人們並沒有更偏好華語。表面上他們比其他階級偏好華語，是因為他們在獨尊華語的教育體制下受過更多的篩選與薰陶。

M2-3加入「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兩個變項，其測量方式分別是：「請您用0至10分來表示您自認為是臺灣人的程度，10分表示完全是臺灣人，0分表示完全不是臺灣人。請問您會選幾分？」以及「請您用0至10分來表示您自認為是中國人的程度，10分表示完全是中國人，0分表示完全不是中國人。請問您會選幾分？」<sup>22</sup> 估計結果顯示，臺灣人認同的迴歸係數不顯著，但中國人認同的迴歸係數顯著為正。由此可見，臺灣人認同愈強的人，跟小孩說華語的意願沒有愈低。但是中國人認同愈強的人，跟小孩說華語的意願愈高。其他條件相同，完全中國人認同者想跟小孩說華語的勝算是完全非中國人認同者的1.7倍（ $e^{0.054 \times 10}$ ）。這個統計關聯為政治社會化命題提供了必要但非充分的證據。我們無法排除反向的因果機制：慣用華語者想跟小孩說華語，進而認同獨尊華語的大中國意識。因此，第三小節將進行更嚴格的測試。

---

<sup>22</sup> 臺灣學術界使用最久、最普遍的問法是：「目前社會上有人會說自己是臺灣人，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會說兩者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還是兩者都是？」這種問法的缺點是無法區分認同強度。因此，本研究採取能夠區分認同強度的改良題目。

## (二) 選擇閩南語的因素

由於人們選擇閩南語就是沒有選擇華語，若將上述迴歸模型的被解釋變項置換為「在家裡最常說閩南語」、「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結果大致相反。因此，本小節的重點在於強調沒有完全相反的因素。

M3-1可說是M1-1的鏡像：父母不全為福佬人者、女性、愈年輕的世代、新中產階級，較不常在家裡說閩南語（表2）。M3-2加入教育程度，如同M1-2，出生世代的迴歸係數大幅縮水，新中產階級的迴歸係數也不再顯著。教育程度方面，國中與小學以下也沒有顯著差異。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人們，隨著學歷提高而愈來愈不傾向在家裡說閩南語。不同的是，M1-2顯示197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傾向說華語；M3-2顯示194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不傾向說閩南語。換言之，2013年時，戰後第一代已流失閩南語，但戰後第二代才將華語作為第一語言。

**表2 選擇閩南語的迴歸分析**

	最常說閩南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		
	M3-1	M3-2	M4-1	M4-2	M4-3
雙親族群（對照組：福佬）					
福佬+客家	-1.540** (0.304)	-1.570** (0.318)	-1.150** (0.287)	-1.145** (0.291)	-1.063** (0.290)
福佬+外省	-1.940** (0.319)	-1.814** (0.325)	-1.387** (0.283)	-1.262** (0.285)	-1.134** (0.290)
皆非福佬	-3.217** (0.259)	-3.227** (0.264)	-3.159** (0.267)	-3.108** (0.269)	-2.806** (0.270)
女性	-0.647** (0.116)	-0.734** (0.122)	-0.467** (0.113)	-0.498** (0.115)	-0.535** (0.118)

	最常說閩南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		
	M3-1	M3-2	M4-1	M4-2	M4-3
出生世代 (對照組：1945以前)					
1946~1955	-0.834** (0.253)	-0.526* (0.265)	-0.750** (0.239)	-0.549* (0.248)	-0.600* (0.261)
1956~1965	-0.994** (0.240)	-0.527 (0.272)	-1.104** (0.226)	-0.798** (0.253)	-0.870** (0.266)
1966~1975	-1.703** (0.241)	-0.899** (0.280)	-1.378** (0.228)	-0.825** (0.262)	-0.849** (0.274)
1976~1985	-2.140** (0.248)	-1.073** (0.290)	-1.978** (0.235)	-1.288** (0.273)	-1.336** (0.284)
1986~1994	-2.618** (0.266)	-1.378** (0.312)	-2.810** (0.263)	-2.018** (0.303)	-2.209** (0.316)
教育程度 (對照組：小學以下)					
國中		-0.039 (0.263)		0.000 (0.240)	0.141 (0.249)
高中職		-0.907** (0.231)		-0.745** (0.216)	-0.677** (0.222)
專科		-1.742** (0.260)		-1.044** (0.244)	-0.967** (0.250)
大學		-1.876** (0.282)		-1.178** (0.266)	-1.063** (0.272)
研究所		-2.391** (0.367)		-1.346** (0.331)	-1.295** (0.337)
階級 (對照組：非技術工人)					
僱主	-0.242 (0.220)	-0.043 (0.227)	-0.512* (0.210)	-0.372 (0.215)	-0.420 (0.221)
自營業者	0.335 (0.189)	0.306 (0.198)	0.399* (0.182)	0.366* (0.186)	0.318 (0.191)
新中產階級	-0.689** (0.132)	-0.099 (0.149)	-0.377** (0.130)	-0.034 (0.144)	-0.070 (0.147)
臺灣人認同					0.083* (0.039)
中國人認同					-0.080** (0.017)
常數	2.262** (0.232)	2.463** (0.250)	1.872** (0.218)	2.001** (0.231)	1.537** (0.443)
Nagelkerke R <sup>2</sup>	0.384	0.436	0.341	0.363	0.376
N	1819	1819	1819	1819	1775

註：括弧內為標準誤。\* p<0.05, \*\* p<0.01

M4-1也差不多是M2-1的鏡像：父母不全為福佬人者、女性、愈年輕的世代、新中產階級、僱主，較不偏好跟小孩說閩南語（表2）。唯一的差別是，自營作業者（比非技術工人）偏好跟小孩說閩南語的趨勢達到統計顯著水準。M4-2加入教育程度，如同M2-2，出生世代的迴歸係數縮水，新中產階級、僱主的迴歸係數也不再顯著。不過，M2-2顯示197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偏好跟小孩說華語；M4-2顯示1946年以後出生者顯著比戰前世代不偏好跟小孩說閩南語。這再次顯示，2013年時，戰後第一代已流失閩南語，但戰後第二代才將華語作為第一語言。比較M3-2與M4-2，2013年時「鄉土語言教育世代」最常說閩南語的勝算是戰前世代的0.25倍（ $e^{-1.378}$ ），但他們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的勝算只剩戰前世代的0.13倍（ $e^{-2.018}$ ）。如此看來，閩南語到了他們的下一代還會更加衰微。教育程度方面，M4-2的迴歸係數都大於M3-2，且學歷愈高增加愈多。這再次顯示，有些高學歷者出現挽回閩南語的心態。只不過，回頭轉移的人數不足以扭轉學歷愈高愈不傾向跟小孩說閩南語的趨勢。

M4-3加入「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兩個變項，自營作業者的迴歸係數不再顯著。重點是，臺灣人認同的迴歸係數顯著為正，顯示臺灣人認同愈強的人，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愈高。這個統計關聯為政治社會化命題提供了必要但非充分的證據。我們還是無法排除反向的因果機制：慣用閩南語者想跟小孩說閩南語，進而認同復興閩南語的臺灣意識。同樣地，第三小節將進行更嚴格的測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認同的迴歸係數顯著為負，顯示中國人認同愈強的人，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愈低。比較M2-3，我們可以發現臺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是不對稱的：臺灣人認同不排斥華語，但中國人認同排斥閩南語。因此，兩種認同強度相當的雙重認同者，會比較偏好跟小孩說華語。

如果我們再將迴歸模型的被解釋變項置換為「在家裡最常說的語言包含客語」、「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客語」，大抵仍得到跟表1相反的結果。不過，由於樣本中的客語人口太少，經由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等因素細切之後，不容易得到穩定的估計值。因此，本文省略客語的迴歸模型。

### (三) 語言轉移與民族認同的關聯

爲了排除「慣用華語者想跟小孩說華語，進而認同獨尊華語的大中國意識」此種因果機制的干擾，表3的M5剔除在家裡最常說華語的受訪者。這個迴歸模型的被解釋變項爲「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並控制所有其他變項。估計結果顯示，臺灣人認同的迴歸係數不顯著，中國人認同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換言之，對於非最常說華語者而言，中國人認同愈強烈，跟小孩說華語的意願愈高。由於反向的因果推論：「其他條件相同，非最常說華語者由於未知原因想跟小孩說華語，進而

表3 語言轉移的迴歸分析

條件	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	
	不是最常說華語者	不是最常說閩南語者	
		M5	全部
		M6-1	M6-2
臺灣人認同	-0.014 (0.052)	0.043 (0.056)	0.036 (0.059)
中國人認同	0.047* (0.022)	-0.052* (0.026)	-0.045† (0.027)
Nagelkerke R <sup>2</sup>	0.175	0.224	0.154
N	1236	980	745

註：已控制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括弧內為標準誤。

† p<0.1, \* p<0.05

認同中國」缺乏說服力，這個統計關聯更強烈地支持：中國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

同理，表3的M6-1剔除在家裡最常說閩南語的受訪者。這個迴歸模型的被解釋變項為「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並控制所有其他變項。估計結果顯示，臺灣人認同的迴歸係數不顯著，中國人認同的迴歸係數顯著為負。換言之，對於非最常說閩南語者而言，臺灣人認同愈強，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沒有愈高；但是中國人認同愈強，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愈低。這再次顯露中國人認同對閩南語的排斥。不過，非慣用閩南語者包含許多客家人子女或外省人子女。他們的臺灣人認同不見得會引導他們跟小孩說閩南語。因此，M6-2進一步剔除雙親皆非福佬人的受訪者，只留下非最常說閩南語的福佬子女（包含父母只有一方為福佬人）。結果，臺灣人認同的迴歸係數依然不顯著，甚至更接近0。換言之，對於非最常說閩南語的福佬子女而言，臺灣人認同愈強，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還是沒有愈高。值得注意的是，前面的M4-3不是指出「臺灣人認同愈強的人，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愈高」嗎？我們該如何理解M4-3與M6-2的差異呢？別忘了，M4-3包含最常說閩南語者，M6-2則無。最常說閩南語者的臺灣人認同（平均9.48）高於其他人（平均8.81），且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73.2%）高於其他人（18.2%）。因此「臺灣人認同」與「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在M4-3中產生正向關聯。一旦剔除最常說閩南語的受訪者，「臺灣人認同」與「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就沒有關聯了。由此可見，慣用閩南語者平均擁有較強的臺灣人認同，但臺灣人認同不會使非慣用閩南語者轉用閩南語。尤其，對於流失閩南語的福佬家庭而言，臺灣人認同再強也無助於恢復閩南語了。



#### (四) 鄰近效應

家庭語言的選擇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也受到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接下來，我將結合個體層次資料（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與總體層次資料（人口普查），藉由多層次模型估計鄰近效應的強度。

M7-1、M7-2與M7-3的被解釋變項為「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表4）。M7-1為零模型，不考慮任何因素，只看變異的分布。樣本中58個鄉鎮區的變異量占總變異量的25.8%。M7-2加入所有個人層次因素，包括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臺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使地區層次變異減少四分之一（0.337→0.251）。M7-3考慮各鄉鎮區的華語盛行率，又解釋了三分之一的地區層次變異（0.251→0.168）。華語盛行率的迴歸係數為2.301，表示居住地的華語盛行率每增加1%，人們最想跟小孩說華語的勝算就提高2.3%（ $e^{2.301 \times 1\%} = 1.023$ ）。這是非常強烈的影響。假設甲、乙兩人的雙親族群、性

表4 多層次迴歸分析

	最希望跟小孩說華語			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		
	M7-1	M7-2	M7-3	M8-1	M8-2	M8-3
個人層次因素		✓	✓		✓	✓
華語盛行率			2.301** (0.675)			
閩南語盛行率						2.792** (0.451)
個人層次變異 ( $\sigma^2$ )	0.969	0.935	0.944	0.959	0.909	0.916
地區層次變異 ( $\tau$ )	0.337	0.251	0.168	0.651	0.383	0.228
ICC	0.258	0.211	0.151	0.404	0.296	0.199

註：個人層次因素包括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臺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括弧內為標準誤。\*\*  $p < 0.01$

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民族認同完全相同，唯甲住在臺北市大安區（華語盛行率96.1%）、乙住在彰化縣芳苑鄉（華語盛行率31.7%）。根據M7-3的估計，甲最想跟小孩說華語的勝算會是乙的4.4倍（ $e^{2.301 \times (96.1\% - 31.7\%)}$ ）。

M8-1、M8-2與M8-3的被解釋變項為「在家裡最希望跟小孩說閩南語」（表4）。M8-1為零模型，不考慮任何因素。結果顯示，人們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具有比華語更大的地區差異，地區層次變異量占總變異量的40.4%。M8-2加入所有個人層次因素，使地區層次變異減少四成（0.651→0.383）。M8-3考慮各鄉鎮區的閩南語盛行率，又解釋了四成的地區層次變異（0.383→0.228）。閩南語盛行率的迴歸係數為2.792，表示居住地的閩南語盛行率每增加1%，人們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的勝算就增加2.8%（ $e^{2.792 \times 1\%} = 1.028$ ）。相較於華語，人們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意願受到周遭語言環境更強烈的影響。

## 五、結論

透過迴歸分析的釐清，我們已能掌握當前臺灣民衆家庭語言的基本輪廓。首先，來自外省家庭與各種跨族群通婚家庭的人們皆偏好說華語；父母皆為客家人者也比父母皆為福佬人者傾向說華語。換言之，客家人流失客語的幅度比福佬人流失閩南語的幅度更劇烈。性別方面，如同社會語言學的典型模式，女性較偏好使用優勢的語言——華語。此外，愈年輕的世代、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們，愈偏好在家裡說華語。這些發現符合一般常識，並不讓人感到意外。不過，本研究也有兩個嶄新發現。其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2013年時戰後第一代已流失閩南語，但戰後第二代才將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其二，有些高學歷者出現挽

回閩南語或客語的心態。只不過，回頭轉移的人數還不足以扭轉學歷愈高愈傾向跟小孩說華語的趨勢。

本研究的重點是釐清尙未明瞭的社會階級與民族認同的作用，以及估計周遭語言環境的影響（鄰近效應）有多強。階級區隔命題指出：「受益於華語而獲得較高地位的受僱者——新中產階級，爲了延續其相對優勢，最可能跟小孩說華語。」然而，調查資料並不支持這個命題。雖然新中產階級最常說華語且最偏好跟小孩說華語，但是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條件下，家庭語言沒有階級差異。換言之，新中產階級對於華語的偏好，來自於他們在獨尊華語的教育體制下受過更多的篩選與薰陶。階級本身，並未對家庭語言產生直接影響。不過，這不表示新中產階級無法透過教導下一代「優雅的談吐」來區隔階級。衆所周知，所謂「臺灣國語」雖然也是華語，卻很容易用來區別出身背景的差異。本研究使用的調查資料不能分析語音層次的問題。

政治社會化命題指出：「中國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臺灣人認同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臺灣本土語言。」這個命題只有前半段獲得明確支持。中國人認同確實使本身不是最常說華語的人轉而跟小孩說華語。但是，臺灣人認同無法讓流失閩南語的福佬家庭恢復閩南語。<sup>23</sup> 此外，臺灣人認同不排斥華語，但中國人認同排斥閩南語。因此，兩種認同強度相當的雙重認同者，會比較偏好跟小孩說華語。這是否意味臺灣人認同較具包容性呢？我想，這也是迫於現實，不得不然。由於青壯年的閩南語或客語程度已不足以用來思考事情、傳播知識，他們的臺灣人認同再強也無法放棄華語了。愈來愈多人即使表面上還能說閩南語或客語，實際上是以華語思考，開口才轉用閩南語或客語發音。近期的閩南

---

<sup>23</sup> 受限於樣本中的客語人口太少，本研究未直接分析臺灣人認同是否讓流失客語的客家家庭恢復客語，但推測情況不會比閩南語樂觀。

語連續劇，充斥著披上閩南語外衣的華語句子，可見一斑。因此，排斥華語的臺灣人認同已不可能將臺灣民衆凝聚起來了。臺灣民族主義者轉而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語言平等」，主張將各族群的語言都認定為「國家語言」。對此，中國民族主義採取抗拒的態度。2003年的「語言平等法」與2007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皆遭到中國國民黨封殺。2016年，再度執政的民進黨重新提出「國家語言發展法」。中國國民黨立法院書記長林德福質疑這個法案意圖去中國化（符芳碩 2016）。

鄰近效應命題指出：「居住地的華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華語；居住地的閩南語盛行率愈高，人們愈傾向跟小孩說閩南語。」調查資料完全符合這個命題。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階級、民族認同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一旦生活在不同的語言環境裡，確實可能做出不同的家庭語言選擇。雖然交通與通訊技術的革新使人們能夠進行遠距離交談，鄰近效應並沒有在現代社會中消失。基於從衆與網絡外部性，家庭語言依然有順從地方主流的壓力。由於臺灣人口持續往華語優占的北部都會區遷移，<sup>24</sup> 愈來愈多家庭失去本土語言的環境。如此，閩南語、客語的傳承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蕭阿勤（2012）指出，復興臺灣本土語言的種種努力，構成臺灣民族主義的重要部分。但是本研究發現，臺灣人認同的崛起未能復興本土語言在家庭中的地位，這也難怪鍾老如此憂心了。那麼，客家話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快要消失了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瀕危語言分為五個等級：脆弱（vulnerable）指大部分小孩能講這種語言，但是僅侷限於特定領域，如家庭；明顯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指小孩在家裡不再學習這種語言；嚴重瀕危（severely endangered）指只有祖父

---

<sup>24</sup> 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2011-2015年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合計遷移增加109,674人，其他縣市合計遷移減少38,064人。

母世代講這種語言，父母世代聽得懂，但是不講；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指祖父母世代只會講一些，但不常講；滅絕（extinct）就沒有人講了。臺灣有24種語言被列入瀕危語言名單中，全部都是南島語（UNESCO 2016）。<sup>25</sup> 客語不在瀕危語言名單中，但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客語至少符合「脆弱」標準。201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即使父母都是客家人者，也只有45.4%的家庭常用語包含客語（圖1）。如果父母有任何一方不是客家人，客語使用率就更低落了。進一步觀察正要進入生兒育女階段的1986-1995年出生世代，樣本中的52名客家子女只有3人的家庭常用語包含客語、只有1人最想跟小孩說客語。如此看來，客語到了他們的下一代就達到「嚴重瀕危」等級了。閩南語的處境還沒有客語那麼險峻，但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樣觀察1986-1995年出生世代，福佬人的子女有26.0%在家裡最常說閩南語，21.7%為華語、閩南語並用，合計不到一半。他們最想跟小孩說閩南語的比例，只剩20.2%。表面上，目前能說閩南語的人口還很多。但是三十年後，戰後第二代將發現他們說閩南語的主要對象——戰後第一代，整批不見了。

以往，閩南語、客語的日漸衰微可歸因於國家力量的壓制。然而，當公共領域不再限制各種本土語言的使用，小學也開始安排「鄉土語言」課程，為什麼閩南語、客語還是每下愈況？2013年的調查資料顯示，1986-1995年出生世代雖曾在學校裡接觸「鄉土語言」課程，但是

---

<sup>25</sup> 脆弱：泰雅語、太魯閣語、鄒語、魯凱語、排灣語、阿美語、卑南語、雅美語。明顯瀕危：布農語。嚴重瀕危：賽夏語。極度瀕危：噶瑪蘭語、邵語、卡那卡那富語、拉阿魯哇語、Nataoran。滅絕：凱達格蘭語、馬賽語、龜崙語、道卡斯語、巴宰語、拍瀑拉語、巴布薩語、洪雅語、西拉雅語。事實上，這份名單過於樂觀了，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評估，泰雅語、太魯閣語、鄒語、魯凱語、排灣語、阿美語、雅美語已達到「明顯瀕危」；卑南語達到「嚴重瀕危」（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 148）。

在家裡說閩南語或客語的比例不見反轉，跟下一代說閩南語或客語的意願更爲低落。即使「還我母語運動」的訴求一一實現，鍾肇政推動的「客家電視臺」也成立了，卻仍然是這樣的結果。我想，這不只是鍾老的煩惱，也會是所有本土語言復興運動者的煩惱。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雖然國家力量不再壓制，但是華語比較優越的價值觀已經內化到多數臺灣民衆心中了。換言之，華語已經成爲一種文化霸權，即使不用強迫，民衆也會自願順從。<sup>26</sup> 雖然臺灣民族主義的菁英試圖挑戰華語霸權，但臺灣民衆日益高漲的臺灣人認同卻與屹立不搖的華語霸權共存。這個現象相當耐人尋味，值得進一步探討。受限於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未詢問語言態度方面的題目（例如：是否認爲華語比較有地位？有學問？），本研究無法提供直接證據。後續調查若能在包含家庭語言題目的問卷中加入語言態度相關題目，有助於語言霸權研究的發展。

橫剖面資料呈現之統計趨勢，本質上都是相關，對於檢驗因果關係而言不夠充分。考量長期追蹤調查有現實上的困難，我們可以在一次性調查中詢問受訪者不同生命階段的經驗，這樣對於釐清因果關係會有一些進步。換言之，我們除了詢問受訪者現在的家庭語言，最好也詢問其不同生命階段的家庭語言，特別是受教育之前、出社會之前。如此，年齡級差現象（如果有的話）也能夠被指認出來。此外，詢問家庭語言時最好區分交談對象是誰。人們跟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小孩說的話可能會有差別。

鍾老很擔憂：「客家話一旦消失，客家人就消失了。」究竟閩南語、客語的衰微，是否也會導致福佬人、客家人族群意識的消退呢？由於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缺乏適合的題目，本研究無法回答這個問

---

<sup>26</sup> 感謝匿名審查人之一建議這個具有洞察力的論點。

題。我的建議仍然是在包含家庭語言題目的問卷中加入族群意識相關題目。例如：是否樂於主動表示自己是某族群？某族群的身分對於自己有多重要？

限於樣本規模，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對於客語不足以建立穩固的多變量迴歸模型；對於人口更少的原住民與新移民，更是連統計推論都不可能。不過，客家委員會已完成八次大規模的「客語使用狀況調查」，另有四次「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包含客家人的語言使用情形。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剛發布16個原住民族的語言調查成果（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這些針對少數族群的大樣本僅用於簡單交叉列表，相當可惜。未來，利用這些資料進行多變量迴歸分析，勢在必行。另一方面，東南亞移民的語言傳承是臺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大資產。政府有責任支持新移民家庭語言的調查研究。

量化研究讓我們掌握家庭語言的整體趨勢以及變項之間的關聯，但是不能告訴我們：這些語言現象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演？例如，本研究雖再次確認「女性的語言順從」，卻無法說明：這樣的語言規訓是如何實踐的？說話不夠標準的少女如何遭人白眼？女性是傳承母語的靈魂人物，我們需要瞭解語言性別化的更多細節。此外，夫妻之間、婆媳之間，如何協商跟小孩說什麼話？尤其當他們的態度不一致時。倘若父母想跟小孩說的語言跟小孩想跟父母說的語言不一致，又是如何互動呢？諸如此類，都有賴質性研究加以回答。

### 作者簡介

葉高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追求跨學科的整合性研究，作品涵蓋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2013年起，研究聚焦於族群相關議題，包括：集團移住（集體遷村）政策如何擾亂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網絡，福佬、客家交界地帶的人群互動，以及語言、族群現象如何互相纏繞。



## 參考書目

- 王甫昌，1994，〈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6: 43-96。
- \_\_\_\_，1996，〈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 129-209。
- \_\_\_\_，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 民主進步黨，2016，〈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第三場電視政見會 第一輪政見發表全文〉。http://www.dpp.org.tw/mobile3/index\_content.php?sn=8727，取用日期：2016年7月28日。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林正慧，2015，〈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林宗弘，2009，〈臺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43: 93-158。
- \_\_\_\_，2013，〈失落的年代：臺灣民衆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5(4): 689-734。
- 施添福，2013，〈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質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 1-56。
- \_\_\_\_，2014a，〈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 1-114。
- \_\_\_\_，2014b，〈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 1-110。
- 洪惟仁，1992，〈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

- \_\_\_\_, 2003a, 〈臺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語音標記性〉。《中國社會語言學》1: 34-56。
- \_\_\_\_, 2003b,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形成與發展——發祥地的追溯與語言層次、共時演變的分析〉。《臺灣語文研究》1: 25-67。
- \_\_\_\_, 2004, 〈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臺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聲韻論叢》13: 219-250。
- \_\_\_\_, 2012, 〈閩南語入字頭（日母）的音變潮流〉。《臺灣語文研究》7(2): 1-33。
-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6, 《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實施計畫16族綜合比較報告》。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符芳碩, 2016, 〈綠委提「國家語言發展法」 藍委批操弄族群〉。蘋果即時,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424/845761/>, 取用日期：2016年11月30日。
- 陳婉琪、溫郁文, 2010, 〈講啥米話咁唔要緊？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異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刊》44: 1-54。
-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_\_\_\_, 2010, 〈語言因素與社會因素對音變的影響——以鹿谷及安平方言為例〉。《清華學報》40(2): 159-191。
- 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2014,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臺北：文鶴。

黃菊芳、蔡素娟、鄭錦全，2012，〈臺灣雲林縣崙背鄉客家話分布微觀〉。頁95-123，收錄於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葉德聖，2013，《您不能不知道的臺灣客家運動》。臺北：五南。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1909，《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漢譯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統計課。

蔡淑玲，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臺灣男性的族群差異〉。《臺灣社會學》1: 65-111。

蕭阿勤，2012，《重構臺灣》。臺北：聯經。

簡秀梅、洪惟仁，2007，〈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回頭演變之社會方言學研究〉。頁45-66，收錄於王旭、徐富美編，《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法論文集》。臺北：文鶴。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sch, Solomon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70(9): 1-70.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ustmann, Christian, 1994, "Speaking Fluency, Writing Fluency and Earning of 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7(2): 133-156.

Economides, Nicholas, 1996,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 673-699.

Evan, M. D. R., 1987, "Language Skill, Language Usage and Opportunity."

*Sociology* 21: 253-274.

Holmes, Janet,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_\_\_\_\_,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McManus, Walter, William Gould and Finis Welch, 1983 “Earnings of Hispanic Men: the Role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2): 101-130.

Mouw, Ted and Yu Xie, 1999, “Bilingualism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s: Accommodation With or Without Assimi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232-252.

Neidert, Lisa J. and Reynolds Farley, 1985, “Assimi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Ethnic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in Status and Achie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840-850.

Portes, Alejandro and Dag MacLeod, 1996,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Children of Immigrants: The Roles of Class, Ethnicity, and Social Contex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4): 255-275.

Rooth, Dan-Olof and Jan Ekberg, 2006, “Occupational Mobility for Immigrant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4(2): 57-77.

Shields, Michael and Stephen Wheatley Price, 2002, “The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nd Occupational Success of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 Men Living in English Metropolitan Area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5(1): 137-160.

Smits, Jeroen and Ayse Gunduz-Hosgor, 2003, "Linguistic Capital: Language as a Socio-Economic Resource Among Kurdish and Arabic Women in Turke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5): 829-853.

Tienda, Marta and Lisa. J. Neidert, 1984,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of Hispanic Origin M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5: 519-536.

UNESCO, 2016, *UNESCO 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 <http://www.unesco.org/languages-atlas/en/atlasmap.html> (Date visited: July 28, 2016).

Young, Russell, 198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on Taiwan*. Taipei: Crane.